



以色列是世界上第六个和中东第一个研发和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以色列究竟拥有多少核武器很难确切地推测，但从质量上讲以色列的核力量应当与法国和英国的核武器旗鼓相当。

以色列在发展核武器和政策

越雷池一步。印刷品使用“核武器”(与以色列的武器有关)一词也被视作违法。为此，以色列人常常使用一些委婉的词语来代替，如“核选择”、“核潜力”、“核能力”或其他更为缓和的一些词语，如“战略武器”。40年后的今天，这一政

一些西方国家的眼中，国际不扩散机制适用于每个国家，但不适用于以色列。因此，广大无核国家指责美国在国际防扩散中采用双重标准。以色列核武器例外论，得以使以色列不参加核不扩散机制，不受国际不扩散机制的监督和不履行其

以色列的核秘密

侯红育/文

方面与5个核大国和印巴不相同。以色列从来没有宣传，甚至从来没有承认拥有核武器。自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列维·埃什科尔总理宣布“以色列不会是将核武器引入中东的第一个国家”起，其后8任总理都没有离开这个模棱两可的立场半步。

以色列跨越核门槛近40年之后，其领导人仍严守核秘密，继续实行40年前刚开始研制核武器时的管制政策。国际社会在加强防扩散机制和努力解决伊朗和朝鲜核问题时，不会对以色列的核问题视而不见。正如国际原子能机构主席艾尔巴拉迪所言，当前人们问得最多的问题是“对以色列怎么办？”

以色列作为例外

以色列对核武器研发和宣传实施严格的军事管制。这一政策使以色列核武器计划成为“暗箱”或“黑洞”。军事保密检查办公室负责维持这一禁忌，以色列官员和公民不得谈论任何有关以色列的核计划，记者和作家更是不敢

策仍在严格执行，大批军事保密检查人员在继续删除被禁用的词汇，或在以色列人写的文章前加上一段话：“根据国外有关报道”。

核模糊政策不只是官方政策或国家战略，已经融入以色列的社会生活。政府的核模糊政策和整个社会的保密文化氛围，已成为一枚硬币的两个面。以色列是个“民主社会”，但以色列国民在核问题上不使用其民主权利，对核问题不闻不问。

但是，以色列的核模糊政策不只是以色列本国的事务，已成为国际不扩散机制长期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国际防扩散机制对所有无核国家一视同仁，但以色列的核问题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怪现象。在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以色列的核问题日益成为一个最敏感的问题，几乎是问不得的。以色列与美国达成的“不问，不告诉”的双边安排近几十年来演变成一种政策，即美国将以色列的核问题视作国际防扩散机制的一个例外。美国利用其外交影响和实力来庇护以色列。在美国和

义务，但可完全享受其好处。

以色列核禁忌的形成

1961年1月19日，美国当选总统约翰·肯尼迪在宣誓就职前夕，向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的第一组问题中，有一个问题是未来的核扩散国家有哪几个。在场的国务卿克里斯琴·赫脱立即回答说：“以色列和印度”。只是在几周之前，艾森豪威尔政府才知道近3年来以色列一直在内盖夫沙漠附近的迪莫内秘密建造核设施。如果美国不阻止，以色列就会在10年内或更短的时间内成为核国家。

实际上，以色列探索发展核武器的想法始自立国之初。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本·古里安从独立战争之始就考虑到核选择，认为发展核武器可以解决以色列的安全困境。他认为，只有技术才能为以色列提供质量上的战略优势，可弥补以色列在人口、资源和空间上的弱势地位。前总理希蒙·佩雷斯称：“本·古里安认为，科学可以补偿大自然拒绝我们的东西”。这一句话从本质上阐明了以



色列发展核武器的全部哲学。

起初,美国的决策者将以色列视作核扩散的一个特别案例。1961年,国际社会尚未制定不扩散准则。在美国看来,以色列是美国盟国和美国遏制政策之外的一个小国和友国,被更大的敌国所包围,而且这些敌国发誓要摧毁它。最重要的是,以色列受到美国国内的支持。肯尼迪非常清楚地知道,没有国内80%的犹太人投票支持他,他就不可能当选总统。

尽管如此,肯尼迪总统决心挫败以色列的核要求。肯尼迪总统的“梦魇”是出现全球核混乱,即全世界有20到30个国家拥有核武器。肯尼迪担心,如果不采取决定性行动阻止核扩散,这一梦魇将在10到20年内变成现实。对肯尼迪而言,以色列处于反扩散战争的中心。他认为,新的核不扩散准则应当从以色列开始实施。如果美国不能影响像以色列这样的小国不发展核武器,就更难说服德国放弃核野心。如果美国不能阻止德国发展核武器,就更不能指望让苏联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

这些考虑引发了美国与以色列在1963年春夏发生的最尖锐的对抗。肯尼迪威胁本·古里安和埃什科尔总理说,美国每两年派检查团到迪莫内进行实地检查一次,如果他的要求得不到满足,美国对以色列的安全承诺“将面临严重危险”。最后,埃什科尔总理“好像”接受了肯尼迪的要求,或者是肯尼迪相信了以色列接受了他的要求。

肯尼迪不久遇刺身亡,继任的林登·约翰逊总统没有将核扩

散问题视作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关切,对以色列核问题并不过分关切。正是在约翰逊任期内,以色列向约翰逊政府承诺不会是“第一个将核武器引进该地区的国家”,与此同时以色列跨越过核武器门槛。当中情局主任理查德·霍尔姆斯最后告诉约翰逊以色列已越过核门槛后,约翰逊命令霍尔姆斯“保守秘密,不要告诉腊斯克(国务卿)和麦克纳马拉(国防部长)”。这样,美以两国形成了对以色列核武器的禁忌。

模糊战略

起初,以色列秘密发展核武器旨在限制和缓和以色列与美国的不扩散政策之间的冲突,同时将阿拉伯国家蒙在鼓里。1966年年底,《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几近完成,以色列已经完成第一个核爆炸装置的研究和设计,但不敢进行试验。从技术上讲,以色列不能越过核门槛,但在政治上却把核武器当作“选择”。埃什科尔政府避免作出任何明确的政治决定。1967年5月,在“6日战争”前夕,以色列秘密组装了两个粗糙的核装置,为最坏的打算做准备,但以色列在使用核武器上很慎重。

1967年,以色列告诉美国,鉴于其安全需要和得不到美国的安全保障,以色列不能放弃其核选择,将不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69年9月,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与美国总统尼克松就核问题达成一个新的秘密谅解。梅厄总理告诉尼克松,以色列被迫发展核武器能力和不能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但承诺以

色列将来不会成为公开宣布的核国家。这意味着以色列将不会进行核试验,将不利用自己的核能力谋求外交利益,但将核武器作为最后诉诸的手段;以色列不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但也不蔑视该条约。1970年7月,美国《纽约时报》公开报道说,美国情报界认为以色列已是核国家。

从1973年至今,以色列的核政策在政治上非常谨慎,但技术发展却非常迅速。在此期间,以色列的核保密政策已发展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色列防务战略家认为,核不透明政策取得了极大的战略成功,给以色列提供了核威慑的所有好处,但付出的政治代价却很低。

政治上的谨慎

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对以色列的核战略思想有重大影响,尽管整个战争的文件仍未解密。多数报道称,在战争初期,国防部长达杨下令将核武器设施准备好,显然是向梅厄总理建议作好使用核武器的装备,以备动用“最后手段”。但梅厄不同意达杨的最坏考虑。美国情报机构获得了以色列将具有核能力的耶利哥导弹提升到高警戒状态的情报。但梅厄拒绝了达杨的建议,不愿滑入使用核武器的边缘。这成为以色列核政策的一个重要遗产。

1973年战争之后的一段时期,以色列国内的一些强硬派认为,以色列应该成为公开的核国家,一些人建议以色列应当发展和部署战术核武器。但到70年代中期,拉宾总理强烈反对公开发展“魔



术武器”(他公开称核武器为“魔术武器”)和制定公开的核战略。拉宾担心阿拉伯与以色列冲突会核武器化。他认为,坚持核不透明政策是他的政治责任。

核不透明政策得以使以色列在国际上鼓吹建立中东无核区的主张。1975年,以色列政府拒绝国际社会要求其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压力。拉宾授权外交部长阿隆在联合国宣布,以色列将支持就建立无核区问题与中东地区所有国家磋商。这是以色列第一次支持无条件建立无核区。当然,以色列提出这一主张主要着眼于避免受到政治孤立,实际上根本不采取任何具体行动。这一主张表明了拉宾政府拒绝采纳公开核威慑的建议。阿拉伯国家长期呼吁建立中东无核区,联合国《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最后文件也作了规定,但由于美国的反对,建立中东无核区至今无任何进展。

核能力的提升

核不透明政策有助于以色列建立有利的环境,可以使其不受干扰地发展核力量。1973年战争后,以色列进入了技术快速发展的新时代,扩大了核武库规模,实现了核武器现代化。

但以色列并没有建立第二次核打击能力。当时,以色列核战略指导思想是,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核垄断并未被打破,如果形势发生变化,以色列仍有充分的时间进行调整。1981年6月,贝京总理决定袭击伊拉克奥西拉克核反应堆,就是对阿拉伯国家的警告,

即以以色列不允许敌对政权拥有核武器能力。

1991年海湾战争之前,沙米尔总理将核不透明政策推到极限。他威胁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说,如果伊拉克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攻击以色列,伊拉克将面临“令人敬畏的和可怕的”反应。美国国防部长切尼对此解释说,如果伊拉克胆敢用化学或生物武器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会使用其核能力。到战争结束时,伊拉克向以色列发射了40多枚载有常规武器的飞毛腿导弹,大部分落在以色列人口中心地区。伊拉克没有对以色列发动化学或生物武器攻击,使以色列人相信秘密的核威慑在阻止萨达姆使用非常规武器袭击方面发挥了作用。

这场战争的经验和教训及新的战略形势发展,使以色列决定建立新的海基战略力量。2000年7月,以色列从德国购买了三艘海豚级潜艇。今天,以色列正在建立陆、海、空三位一体的战略核力量,确保能够在受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攻击后拥有核报复能力。

不履行不扩散义务, 但却享有核威慑的所有好处

以色列的核秘密已扎根于整个社会,融入国家安全文化中。以色列人尊重这一禁忌,不愿损害这一禁忌。核保密人员对这种形势感到很满意,可以不受百姓或当选代表的打扰。

首先,以色列人一致认为,国家安全需要核武器,即以以色列必须获得核武器,必须保持核威慑。在任何环境下,以色列都承担不

起完全抛弃核威慑的代价,即使中东实现了和平也是如此。以色列政府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采取公开措施,削弱其核能力。第二,以色列人深信,国际社会将永远不会同意以色列合法拥有核武器,甚至美国也不会公开接受以色列是一个合法的核武器国家。作为以色列的邻国,阿拉伯国家将永远不会公开接受以色列的核垄断地位。这样,如果以色列公开其核武器发展情况,其他国家将会要求以色列进行核裁军,销毁其核武器。为此,以色列精英认为,即使有限承认核武器和透明也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另一方面,核不透明的政策得以使以色列享有现有核威慑的各种好处,而不需要冒任何风险。如果以色列的核武器不透明,中东地区的其他国家面临国内要求发展核武器的压力会小得多。只要美国继续在核武器问题上庇护以色列,以色列就可继续利用其核威慑。以色列享有国际不扩散机制的所有好处,而不接受任何国际核查。以色列战略学家认为,核不透明是最好的选择,有利于以色列的国家安全。

以色列核武器例外论对国际不扩散机制构成挑战,使国际不扩散机制缺少完整性。当前,国际社会特别是阿拉伯国家强烈要求以色列作为无核国家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但由于受到美国的庇护,以色列不会作为无核国家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会放弃核武器,并将继续执行其核不透明政策。

(本文责任编辑:刘万镇)